

由简帛古书看“文集”与“丛书”的早期形态

邱雯蓉

(西南大学 汉语言文学研究所, 重庆 400715)

摘要:古人一向述而不作,多由后人汇纂其诗文,编撰成书。这种汇纂主要有文集与丛书两种形式,而这两种形式早在先秦时期就已出现。先秦时期古书著于竹帛,且多单篇流传,当时的“文”与“书”之间其实并无明显区分,这一点在简帛古书中有很好的验证,近年出土的不少简帛古书既具有“文集”的性质,又具有“丛书”的性质。可见,“文集”与“丛书”的早期形态其实差别不大。

关键词:文集;丛书;简帛古书;早期形态;先秦时期

中图分类号:K877.5;G25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5639(2016)02-0102-05

DOI:10.14091/j.cnki.kmxyxb.2016.02.017

On the Early forms of the Anthologies and Series from the Ancient Books Written on Bamboo Slips and Silk

QIU Wen-rong

(Institute of Ancient Chinese Language and Documents, Southwest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715, China)

Abstract: The ancient writers always expressed their viewpoints orally instead of recording them on paper and the oral expressions were collected by the later generation to be the works. The two main forms of the collection were anthologies and series, which existed in the pre-Qin period. During that period, the form of the books was bamboo slips and the single article was the main form to be inherited. There was no clear difference between the contemporary articles and books since a lot of unearthed bamboo slips and silk have the qualities of both anthology and series. Therefore, there was no clear difference between the early forms of the anthologies and series.

Key words: anthology; series; ancient books written on bamboo slips and silk; the early form; the pre-Qin period

西周时期,学在官府,书籍是由史官典藏,民间流传的书籍不仅总量少,而且多是零章散篇。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各家纷纷著书立说,成一家之言,文章逐渐增多,于是出现对各家文献进行整理编纂的活动,文集与丛书也就应运而生。在后人的研究中,诸子书,《诗》《书》等经典虽被赋予“文集”或“丛书”的性质,其实在先秦时期,它们都是汇集文献而已,本质上并无明显区分。这与先秦时期的古书体例,以及前人的著述特点不无关系,下文试详述之。

一、“文集”的产生与形式

何为“文集”,顾名思义就是将“文”汇编成书,

汇集的对象包括押韵的文章(即“韵文”)和不押韵的文章(即“散文”)。文集还包括别集与总集,别集是汇集一人作品,总集汇集多人的作品。

文集产生于何时,历来说法不一。本文认为,“文集”最迟在西汉时期就已经出现。兹从以下方面论之:

认为文集起源于先秦的主要有余嘉锡、钱穆等。余嘉锡认为“西汉以前无文集,而诸子即其文集”^{[1]207}。钱穆也持有这一看法:“中国之集部本源于先秦之子部”^[2]。诸子书与文集都是汇集个人文章而成。先秦、西汉之人生平因事论说,逝后由弟子即后人传承,汇集其说,编辑成书,则其形式上有汇

收稿日期:2015-06-04

作者简介:邱雯蓉(1991—),女,江苏常州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古典文献学研究。

集之意,即“自形式而观,古之子即后之集”。^[3]诸子之文专于立言,其文“以其微言大义之所托,言之有物”^{[1]207},则其内容上是立言之说,即说理性散文。由上可知,先秦时期诸子之文是说理散文的汇集。

在四部分类体系中,集部著录者除文集外,还有诗集。诗集在先秦也早已有之,孔子整理《诗》即是实例。《汉书·艺文志·六艺·诗》序:“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孔子纯取周诗,上采殷,下取鲁,凡三百五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讽诵,不独在竹帛故也。”^[4]孔子将各地所采之诗汇集起来,经过整理编纂,最终形成《诗》,则《诗》实有总集的性质。是以韵文的汇集可上推至《诗经》。

综上所述,先秦时期虽无“文集”之名,但已有“文集”之实。

到西汉时期,对某类作品的汇编更为多见。《汉书·艺文志》中的《诸子略》是一人一书,如“《晏子》二十八篇”“《子思》二十三篇”。这些书很多是由刘向等人裒辑众文加以整理,最后编定成型。可见在刘向等人校书之前,篇章多是单行。银雀山汉简中有见于《管子》的《王兵》,是单篇别行的例子。而《别录佚文·管子》叙录:“臣向言:所校讎中管子书三百八十九篇,大中大夫卜圭书二十七篇,凡中外书五百六十四篇,以校除重复四百八十四篇,定著八十篇,杀青而书,可缮写也。”^[5]在五百六十四篇中重复者有四百八十四篇,(或因许多篇章单篇流行,或若干篇结成后以不完整的形式流传,所以才出现如此多的重复。)这说明在刘向之前,人们已经开始有意识地、大规模地对诸子之文进行汇集。

此外,西汉时期政治经济的发展也要求在文学上有所体现,最明显的就是诗赋的繁荣。根据《汉书·艺文志》所著录的《诗赋略》来看,“‘诗’是汉诗,不包括汉以前的‘诗’(汉以前的‘诗’主要是《诗经》,已入《六艺略》);‘赋’则包括少数战国和秦代的作品,主体是西汉时期的赋。”^[6]诗赋作品增多(根据《汉志》的记载,赋已有五种,一百零六家,一千三百一十八篇),诗已分先秦诗与汉诗,赋也有单独的分类,表明西汉时期的文学发展迅速,开始与学术对举。此时的诗、赋独立于经学之外,成为一种文体,故有学者将“别集”的源头追溯至西汉时期刘向的《诗赋略》:

姚振宗在《隋书·经籍志考证》中说道:

别集始于何人,以余考之,亦始于刘中垒也。《诗赋略》五篇,皆诸家赋集、诗歌集,固别集之权舆。^[7]

张舜徽在《四库提要讲疏》中说道:

《隋书·经籍志》云:“别集之名,盖汉东京所创也。”《四库》叙文承用其说,而其实非也。《汉志》之“诗赋略”,即后世之集部也。观其叙次诸家之作,每云某某赋若干篇,各取其传世之文,家各成编,斯即别集之权舆。如云:“《屈原赋》二十五篇”,即《屈原集》也;“《宋玉赋》十六篇”,即《宋玉集》也;“《司马相如赋》二十九篇”,即《司马相如集》也;“《孙卿赋》十篇”,即《荀况集》也;“《所自造赋》二篇”,即《汉武帝集》也。循是以推,则“诗赋略”所录五种百六家之文,大半皆别集矣。是刘向父子校书秘阁时,即已裒集多家之文,依人编定,使可别行。当时无“集”之名,而有“集”之实。集之创始。必溯源于此,不可谓至东汉而后有此体裁也。特后人一一追题,纷加集名耳。^[8]

由上所论可知,《诗赋略》所著录的诸家赋是汇集诗文而成,并有按人汇集诗文、按类汇集诗文这两种不同的方式。从其形式上来看,我们可以将《诗赋略》所汇集的各家之赋看成是后世之“别集”。

文集主要是后世学者对前代文献资料的汇集整理的结果,此种做法先秦时既已产生,到汉代时发展成熟。而作为图书类别之一的“文集”则在刘向整理图籍时也已经存在,他所整理的诸子书,“诗赋略”中所收各家诗赋都属此类。

二、“丛书”的定义与起源

“丛书”一词最早见于唐代韩愈的《剥啄行》,其中一句诗是“门以两版,丛书其间。”^[9]此时“丛书”乃是汇集众多书籍之意。唐陆龟蒙的《笠泽丛书》首次以“丛书”为书名,其《丛书序》说:

丛书者,丛脞之书也。丛脞,犹细碎也。细而不遗大,可知其所容矣……歌诗赋颂,铭记传序,往往杂发,不类不次,混而载之,得称丛书。^[10]

从这篇《序》可知,陆龟蒙汇聚的是零散的“歌诗赋颂,铭记传序”,繁杂混载,故陆龟蒙所谓的“丛

书”其实就是“文集”。

关于“丛书”的定义,各说不一。清王鸣盛解释为“取前人零碎著作,难以单行者汇刻。”^[11]清钱大昕在《百川书海》跋中定义为“荟萃古人书,并为一部而以己意名之。”^[12]清李调元解释为“以数人之书合为一编,而别提一总名者。”^[13]这些解释,都围绕汇集之意,但汇集之对象各有偏重,概括具有片面性,例如钱大昕所说的“荟萃古人书”,则今人书不包括在内。学者曹培根就在《中国古籍丛书定义和起源问题论争书评》^[14]中详细罗列了各家关于“丛书”的定义,也论述了各家定义的不足之处。目录学著作中也有关于“丛书”的定义,解释较为全面,如汪辟疆在《目录学研究》中解释为“总聚众书而为书者,谓之丛书。”^[15]程千帆《校雠广义·目录编》解释为“按照一定的原则(如或属同一个作者,或属同一学科,或属同一时代,或属同一地区),采用相同的物质形式(如一样的版面,一样的装订形式)把一些著作会刊在一起的系列书籍。”^[16]杜泽逊的《文献学概要》解释为“丛是丛聚之义,丛书指把多种不同的书编在一起,冠以一个总名。”^[17]总而言之,“丛书”,就是将两种以上的书汇集起来。

关于“丛书”的起源,学者论述很多,众说纷纭,至今也没有定论。有起源于宋代说,如钱大昕认为丛书起源于《百川书海》,这一看法被缪荃孙推翻,他在《校勘<儒学警悟>七集序》中认为俞鼎孙、俞经编的《儒学警悟》一书早《百川书海》七十多年,是丛书的起源。《中国丛书综录》继承了缪氏的这一看法。有起源于五代说,如清代学者王鸣盛认为丛书起源于五代的《九经》,时间早于之前的起源于宋代说。程千帆、徐有福在《中国古典文学史料学》中也有此论述。还有起源于秦汉说,以汪辟疆、姚名达为代表。

汪辟疆的《目录学研究》:

丛书之制,在周汉而已开,《乐》正四术,《诗》存三经,《书》有六体之殊,《易》有《十翼》之作,丛书之源远肇于此。^{[17]240}

姚名达的《中国目录学史》:

诗、书者,上古之丛书也。秦始皇焚“诗、书、百家语”,人知百家语之非只一家,而不知诗、书之为普通名词。夫先秦所谓诗书,犹吾人所谓歌曲、历史。故左氏引《诗》,多属《国风》之篇,而《商颂》《周颂》不在其列,《大雅》《小

雅》则举篇名。可知《雅》《颂》非诗,后人始选辑最著名最通俗之《国风》与《雅》《颂》合并为一丛书,乃通称之曰诗耳。书为史官所记,自《虞书》《夏书》《商书》《周书》乃至《郑书》《楚书》,各有专门名词,每一书中各有篇目;其始也,何只千篇;及流传既久,遗失日多,剩余之二十八篇,乃独占书名而删省其冠辞矣。《易》之为杂凑同类而成之丛书,原非一人系统之作,尤属显然。^[18]

程千帆、徐有福虽认为丛书起源于《九经》,但也认为先秦时期的六艺、六经在形式上可以看作是丛书,其在《校雠广义·目录编》中这样说到:

儒家学派把诗、书、易、礼、乐、春秋总称为六艺或六经。传说它们都是经过孔子编定的,都是儒家学派的教材。如果单从这一点讲,六艺或六经就是我国最早的丛书。^[16]

与“文集”一样,“丛书”也是后世学者对前代文献资料的汇集编定的结果,故先秦时期,作为“撰述”体裁的“丛书”也早已出现,先秦时期的《诗》《书》《春秋》等经书即是其例。

三、简帛古书中的文集与丛书

古书都是经由后人整理编纂起来的,章学诚在《文史通义·诗教》中有此论述:“春秋之时,管子尝有书矣,然载一时之典章政教,则犹周公之有官礼也。记管子之言行,则习管氏法者所缀辑,而非管仲所著述。或谓管仲之书,不当称管仲之谥。阎氏若璩又谓‘后人所加,非《管子》之本文。’皆不知古人并无私自著书之事,皆是后人缀辑。”刘向等人的校书活动就是对前代所有文献的汇集整理,当然,刘向之前无论是官方的,还是私人的,已有很多整理编辑的工作。这种对文献材料的整理编纂的结果就产生了文集与丛书。

“文集”与“丛书”,根据它们的定义,其共同点就在汇集上,都是对文献资料的汇集。文集汇集的是文章,丛书汇集的是书。但是,先秦时期古书的特殊性质决定了文与书之间的差别并不是很明显,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三代时,凡依语言文字编著之书册都称为文章”^[19]。汉许慎在《说文解字·序》中提到:“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

相益即谓之字,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著于竹帛谓之书,书者如也”。《正字通·曰部》:“书,凡载籍谓之书。”在先秦时期,文字的载体是竹简,则著于竹简就是书,也可称为文章。

(二)古人著书“因事为文,则其书不作于一时,其先后亦都无次第。随时所作,即以行世”,“其编次也,或出于手定,或出于门人弟子及其子孙,甚或迟至数十年百年,乃由后人收拾丛残为之定著”^{[1]238}。故古书多分合不定,单篇别行。单行之文献既为篇章,也可视为书。如出土简帛之《缁衣》,在郭店楚简、上博简中均有出现,年代相近,内容相似,见于传世《礼记》,可见早期《缁衣》单篇流行,经后人整理编入《礼记》,则,在先秦时期,单篇之《缁衣》既可为书,也可为篇章。

正因为先秦的古书存在单篇别行、书籍分合不定、文与书并非判然有别等情况,所以从简帛古书看文集、丛书,两者很难区分。出土简帛中不乏此类古书,下面举例加以说明。

马王堆帛书《周易》有经有传,“是一部有自己体系的完整的书籍”^{[20]247}。许多学者认为该书并非成于一时一手。帛书《易传》中有很明显的例证,《易传》包括《二三子》《易之义》《要》《繆和》《昭力》《系辞》,其中《二三子》《易之义》《要》三篇成书比《繆和》《昭力》二篇要晚,前者主要是反映秦汉时期的内容,后者主要集中了战国时期的内容。从《易传》五篇对孔子的称呼,可看出《易传》的来源不同,“《二三子问》述及孔子时称‘孔子’,《系辞》和《易之义》称‘子’,《要》则称之为‘夫子’。还有六十四卦之名,各篇多通假字,又各有差异,例如《讼》卦,帛书经文作‘讼’,《易之义》作‘蓉’;《姤》卦,经文作‘狗’,《易之义》作‘均’;《艮》卦,经文作‘根’,而《易之义》作‘谨’这种种,都说明其来源不一。”^{[21]247}根据此段论述,我们可知,《周易》的传文

是汇集各篇而成的,虽成于同一个书手,但是此抄手仅仅是将汇集来的资料抄写了一下,并没有进行比勘校对。故《周易》具有汇编的性质,既可看作是文集,也可看作是丛书。

以上所说先秦时期的文集、丛书多是诸子书或儒家经典。其实在近年出土的简帛古书中,还有其他一些类别的图书也可归为文集或丛书,如《春秋事语》《日书》等。

《春秋事语》,据张政烺的考证应该是秦末汉初的写本,全书共存16章,每章都提行另起,有大圆点作为分章符号,没有篇题。每章各记一事,彼此不相连贯,即不分国别也不论年代先后。《春秋事语》是“语”类体裁的文献,此类体裁的文献还有《国语》《左传》等,沈长云先生说:“《国语》的特点在于它是一部‘语’,是按国别汇集成的‘语’。”^{[21]325}那么《春秋事语》也是汇集“语”而成书的,正如张政烺说到“‘邦国成败,嘉言善语’流传很多,辑录成书的也不少。”^[22]因此《春秋事语》也具有汇集的形式,其汇编的情况也反映了,战国晚期,辑录单篇成书,尚没有条理,只是单纯的汇集而已。

此外,《春秋事语》的出土,引发了学者研究《左传》与《春秋事语》对比的高潮。关于两者的关系,李学勤、骈宇骞等人认为《左传》是《春秋事语》的来源之一^{[20]266-277, [23]①}。《春秋事语》共有16章,其中第一章残缺,难以对比,第二章不见于传世典籍,第三章近于《战国策·赵策一》,其余十三章近于《左传》,但《左传》无帛书的评论,这十三章中,第八章又与《谷梁传》相近,第十六章又与《管子·大匡》相近,从其篇章来看,《春秋事语》显然是将不同来源的材料汇集起来杂抄而成的。

综上所述,《春秋事语》将不同的材料以篇章的形式汇集起来,具有“文集”的性质。又因为先秦时期,文与书的概念不是判然有别,加上《春秋事语》

①李学勤在《〈春秋事语〉与〈左传〉的传流》中从史实内容出发,提出“假如《左传》是袭用《春秋事语》,那么多出的那些事迹过程又从哪里来的呢?如果是杜撰,如何能委屈尽理?如果另有所据,岂不是当时存在另一部《左传》么?这显然是不合理的。”他还认为古书在流传过程中将《左传》的文字简括归并很合理,并举刘向《说苑》《新序》简省《左传》的例子巩固论证。很多学者坚持从叙事体例出发,认为《左传》叙事详细,《春秋事语》叙事简省,则后者应是前者的来源之一(以徐仁甫为代表),李学勤的论证正好反驳了他们的观点。(见于参考文献[20])骈宇骞在《帛书〈春秋事语〉与〈管子〉》一文也认为《左传》在前,《春秋事语》在后,“鲁桓公与文姜会齐侯于乐”并见于《左传》《管子·大匡》《春秋事语》,骈宇骞将三者对比,发现《春秋事语》叙事与《管子·大匡》相近,应是同出一源,又因为《管子·大匡》经后人研究讨论,认为其因袭《左传》而成,故《春秋事语》也是因袭《左传》而成。(见于文后参考文献[23])

是将春秋时期史事言论汇集起来,是以同类性质的内容编撰成册,故《春秋事语》也可说具有丛书的某些性质。

《日书》是一种用来选择时日吉凶的书籍,在战国晚期,应该是生活中的习用之书,刘乐贤认为该书是“选择通书”。如睡虎地秦简《日书》中的《盗者》,多被用来作为审理案件的依据,汇集了多种判定“盗者”的条例。近年来出土的《日书》有很多,江陵九店楚墓、放马滩秦墓、阜阳汉墓、孔家坡汉墓,睡虎地等均有出土,这些《日书》在时间上是前后相继的,在内容上也是相似的,均是此类性质的书。

《日书》是关于选时择日方法的文献的汇编,起初是单篇流行,后经人整理汇集,最终成书。王家台《日书》中的《死失篇》即是实例。《死失篇》,睡虎地《日书》甲乙本也有类似的图文。整理者将《死失篇》分为三部分,最后一部分是“一段按六十甲子顺序讲解‘死失’处向及吉凶情况的文字。”这段文字不见于睡虎地《日书》,见于孔家坡《日书》,但记载比孔家坡日书更丰富,根据这三个《日书》的年代(睡虎地不晚于公元前217年,王家台不晚于秦代,孔家坡公元前142年)可知,这些选时择日的内容原先是单行的,经后人整理汇集(有些篇章未能收集),随着收集的资料越来越多,汇集的也更为完整,其汇编的方式也渐成系统,最终形成较为完善的《日书》。因此《日书》具有文集的性质。又因为文与书的性质不是判然有别,单行之篇章,例如《死失篇》的第三部分,既可以看做是文,也可看做是书,故《日书》也具有丛书的性质。

简帛材料的佐证说明先秦时期文集与丛书的早期形态并非判然有别。先秦时期,简帛古书由于载体等原因,大多篇幅不大,或单篇流传,或汇集短篇成书。后人对这些篇章或者书进行汇集编纂,形成了“文集”与“丛书”。由于“文”“书”没有形成判然有别的区隔,“文集”“丛书”在先秦时期虽然已经出现,但两者其实并无区别。西汉时期,整理图书的规模逐渐加大,先前汇短小篇章成书的做法遂成为人们整理图书的常见方法。到两汉以后,有意识地对文献进行汇集的现象越来越普遍:文集方面,开始出现各个文体的汇集,比如说挚虞的《文章流别集》。丛书方面,则由于围绕某一主题结成的书越来越多,

“文”与“书”的区别越来越明显,遂导致“丛书”名称正式出现时与“文集”已经有了迥然不同的形式,与先秦时期的文献撰述形式相比,已经大大不同。

[参考文献]

- [1]余嘉锡.古书通例[M]//余嘉锡.余嘉锡说文献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 [2]钱穆.现代中国学术论衡[M].北京:三联书店,2001:249.
- [3]刘咸炘.刘咸炘学术论集[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131.
- [4]陈国庆.汉书艺文志注释汇编[M],北京:中华书局,1983:40-41.
- [5]刘向,刘歆.七略别录佚文·七略佚文[M].姚振宗,辑录.邓骏捷,校补.澳门:澳门大学出版中心,2007:43.
- [6]李零.兰台万卷[M].北京:三联书店,2011:122.
- [7]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M]//二十五史补编本:第二册.北京:中华书局,1955:5667.
- [8]张舜徽.四库提要叙讲疏[M].台北:台湾学生书局[c1],2002:205.
- [9]韩愈.剥啄行[M]//全唐诗:卷339.北京:中华书局,1960:1719.
- [10]陆龟蒙.笠泽丛书:丛书序[M].文物出版社,2014.11.
- [11]王鸣盛.蛾术编[M].上海:商务印书馆,1958:223.
- [12]钱大昕.潜研堂文集[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470.
- [13]李调元.童山文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5:37.
- [14]曹培根.中国古籍丛书定义和起源问题论争书评[J].四川图书馆学报,1996(4):66-69.
- [15]汪辟疆.目录学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1955:95.
- [16]程千帆.徐有富.校讎广义:目录编[M].河北: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138.
- [17]杜泽逊.文献学概要[M].北京:中华书局,2008.
- [18]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320.
- [19]张慕华.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J].文史哲,2013(4):150.
- [20]李学勤.简帛佚籍与学术史[M].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
- [21]沈长云.上古史探研:国语编撰考[M].北京:中华书局,2002.
- [22]张政烺.春秋事语解题[J].文物,1977(1):36.
- [23]骈宇騄.帛书《春秋事语》与《管子》[J].文献,1992(2):153-161.